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格局

章雄超 郑林 刘逸超 赖玉萍[1]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要：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部分,是一个地区弘扬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作为历史文化大省,对其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和弘扬江西省历史文化资源,提升赣鄱文化影响力。因此以江西省全国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平均最近邻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分析其与赣鄱文化的关系及原因,旨在为弘扬江西省历史文化,提升赣文化影响力,以及打造江西形象等工作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九江、南昌、樟树、吉安四个集聚区构成的沿鄱阳湖和赣江的赣鄱文化轴带,并于轴带两侧形成了安源、井冈山和瑞金 3 个次级核心区,整体上呈现出“一轴多点”的格局；2)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聚集趋势与赣鄱文化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集聚特点具有从“临水性”到“山地性”的转变；3)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类型呈现出单一到多元再到单一的特征。其不同时期重心移动距离先增后减再增,移动方向总体向南。

关键词： 文物保护单位； 时空演变； 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3679(2019) 06 － 874 － 09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必须在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给予丰富的精神食粮。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历史文化的瑰宝,挖掘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及价值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文物保护单位多为悠久的历史文明之下所形成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重要历史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这些文化瑰宝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研和社会文化价值并且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蕴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智慧、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所以往往会被各级文物部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1,2,3]。

江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省份,有景德镇市(首批)、南昌市(第 2 批)、赣州市(第 3 批)和瑞金市(2015 年新增)共 4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还有近代江西孕育出来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革命源地。因此江西的土地上保留了一大批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其类型之全、保存之完整是别的省份甚至革命经历同样丰富的陕西、山西等省都无法比拟的。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利于江西提升赣鄱文化影响力,推动江西建设成为文化强省。

文物保护单位有其特殊的属性,因此从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和旅游学等[5,7]方面对其相关研究较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1]**收稿日期**：2019-10-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114)；

作者简介： 章雄超(1995-),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评价与旅游开发。； *郑林(1960-),男,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发展规划。Email:zl5366@126.com。；

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价值、现状、保护、规划及其利用与旅游开发[4,5,6]等方面。与之相比,从地理学角度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地理学者更侧重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时空分布格局、空间扩散过程等方面的研究[8,9]。国内对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学角度的研究主要为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基于全国的多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据,奚雪松发现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主要受到地势地形、文化区的划分以及不同自然区的影响较大[1]。朱爱琴在研究湖北省文化遗产中发现,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的演进集聚中心发生变化、集聚类型由多核集聚变为单核集聚[5]。林晓峰对于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研究,揭示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主要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文化基础及文化流派传承 4 个方面[7]。此相关研究还有杨嫚、包书月关于河南和北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等都有研究出本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独有特点[3,4]。综上所述,地理学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有利于探寻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与保护具有借鉴意义。但是目前地理学者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不同地区特点不同。因此本文借助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的同时探寻其与赣鄱文化的关系,以达到对文物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弘扬,提升江西省赣鄱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部华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南岸。全省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南部丘陵逶迤,北部平原坦荡,整个地势由南向北,从外朝内,渐次向鄱阳湖倾斜,构成一个向北敞口的大盆地。境内河流众多,主要由鄱阳湖五大水系赣江、抚河、饶河、信江和修水构成[10]。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青铜文化、瓷器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茶文化以及历史名人、近现代革命斗争留下的遗址遗迹广布全省,颇具特色[11]。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1～7 批(1961-2013 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的 127 处江西境内的文物,以及江西省文化厅公布的 1～6 批(1957-2018 年)1 06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剔除江西省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与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复项,合计 1 112 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本研究主要借助百度地图拾取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属性,运用了 ArcGIS10.2 建立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属性数据库,并绘制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图 1)。

图 1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图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计法核密度估计法是拿来测量空间聚集程度。核密度估计的定义为:设点集 X1,…,Xn 是当作从密度函数为 g 的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 g 在某点 x 处的 g(x)。通常用 Rosenblatt—Parzen 核估计,计算式为[8]:

$$g(x) = \frac{1}{nh}\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式中:k 为核函数; h>0 为带宽; (x-Xi)表示估值点 x 到事件 Xi 处的距离。

1.3.2 平均最近邻指数点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分为:集聚型、均匀型和随机型 3 种状态。利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可以反映和刻画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12],平均最近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overline{r_E} = \frac{1}{\sqrt{\frac{n}{A}}}$$

$$R = \frac{\overline{r_I}}{r_E}$$

式中:A 表示区域面积；n 为区域内的研究对象数；为理论最邻近距离；$\overline{r_I}$为空间实际最邻近距离；R 为最邻近指数。当 R=1 时,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随机分布；当 R<1 时,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集聚分布；当 R>1 时,表示区域内研究对象趋于均匀分布。

2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变化特征

2.1 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变化特征

为了更好的研究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变化特征,并参考前人之相关研究[13],本文将文物保护单位年代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以来时期。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历史阶段均有分布(图 2),从旧石器时代到民国以来其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明清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增长最快,这与该时期赣鄱文化鼎盛有着密切关系。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少时期,民国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最多,其中明清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到总数的 80.75%。从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来看(图 3),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在五大分类中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其中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这两大类比例远高于其它 3 类占到总数的 81%,古遗址、古墓葬和石窟寺及石刻三大分类比例基本相当,石窟寺及石刻这一分类只占全部文物保护单位的 4%,为五大分类中数量最少的一类。此外,不同分类的文物保护单位其随时间推进数量变化的规律有所不同。表 1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结构类型单一,主要集中在古遗址类,因为距离历史时间的远近对文物遗迹的保存影响较大,先秦时期距今遥远大多文物只能以遗址的形式存在。随时间推进其类型不断呈现出多元化,至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型又集中于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所决定,但江西省的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中 474 处有 421 为红色遗迹却是受到江西丰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事件所影响。

2.2 时代重心演变趋势

利用 ArcGIS 中的“Mean Center 工具”得出历史阶段内各自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相关情况(如图 4 所示)。整个移动过程总体向南,移动速度呈现出快慢快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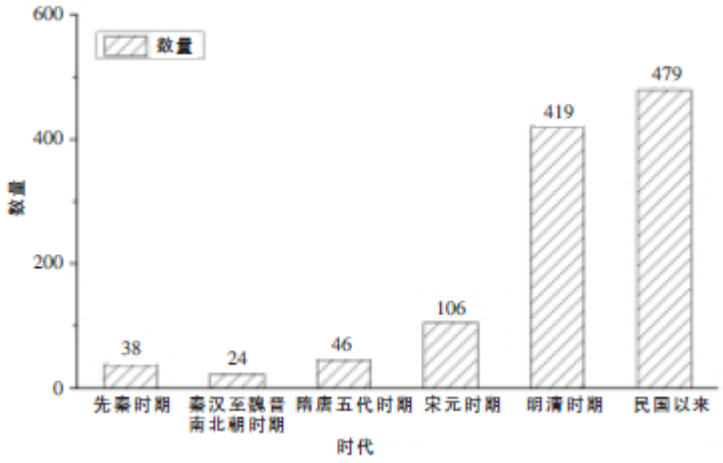

图 2 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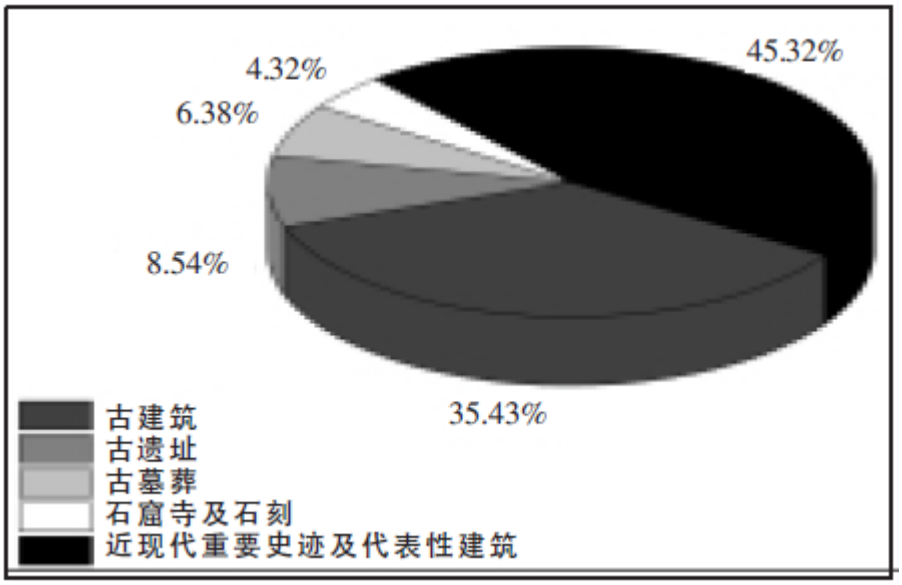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比例

表 1 不同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型数量

	古建筑	古墓葬	古遗址	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总计
史前至先秦时期		5	33			38

秦汉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	3	9	9	3		24
隋唐五代时期	12	9	17	8		46
宋元时期	45	18	22	21		106
明清时期	332	28	14	15	30	419
近代以来	2	2		1	474	479
总计	394	71	95	48	504	1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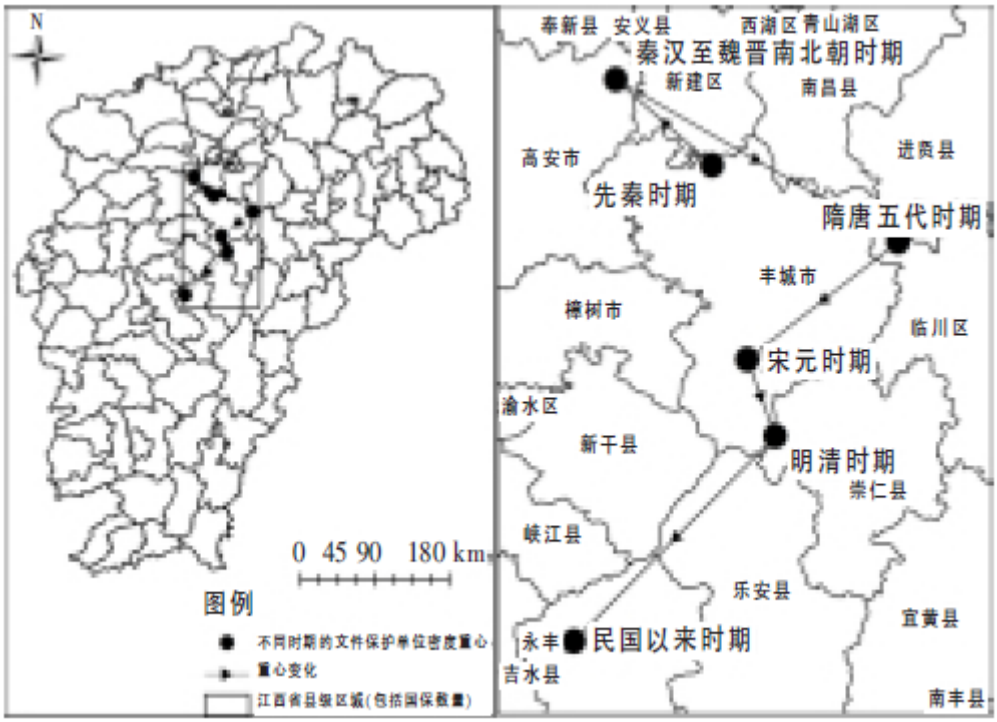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变化图

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其重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足迹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先秦时期江西属于百越之地,因其远离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区域(黄河流域),人类遗迹较少,仅有 38 处被列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以来中原文化开始向南传播,汉代设立豫章郡奠定了江西省基本行政单元对赣鄱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使得秦汉时期的江西文物重心向政治经济中心的豫章郡方向移动。随着东晋时期中原政权衣冠南渡,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以南包括江西在内的地区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进入隋唐时期,鄱阳湖地质构造运动基本完成,奠定了今天的格局,为江西水运地位的提升发挥了稳定的作用。至明清时期凭借交通优势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巅峰。民国以前文物保护单位多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遗迹,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相关性,不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数量开始变多,而且趋于向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移动。民国以后传统的赣鄱文化开始衰弱,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受到赣南的红色革命运动的影响整体上向赣南方向移动。

3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利用 ArcGIS 中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工具,得出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 R 指数为 0.559 236<1,Z 得分为 -28.118 296,P 检验小于 0.01 这说明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在 99%以上的可信度为集聚分布。受水系格局和红色文化影响,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九江、南昌、樟树和吉安 4 个集聚区构成的沿鄱阳湖和赣江的赣鄱文化轴带,并于轴带两侧形成了安源、井冈山和瑞金 3 个次级核心区,整体上呈现出“一轴多点”的分布格局(图 5)。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活动的遗迹,文明的发源往往是依托江河湖泊,赣江作为江西的母亲河,为江西的赣鄱文明的孕育提供水源、交通;赣江和鄱阳湖的河流冲击平原更为古人类的农业生产提供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的自然条件。九江、南昌、樟树和吉安作为赣江、鄱阳湖沿岸的地区人类活动频繁。进入近代,江西省萍乡市、井冈山市、瑞金市成为江西重要的革命摇篮,打响了秋收起义的枪声、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孕育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因此遗留下大量的红色遗迹,为赣鄱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3.1 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3.1.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呈现出来的是“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一时期全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形成以樟树市为中心的聚集大中心和奉新县、靖安县附近形成一个次中心(图 6),全省其他地区虽有分布但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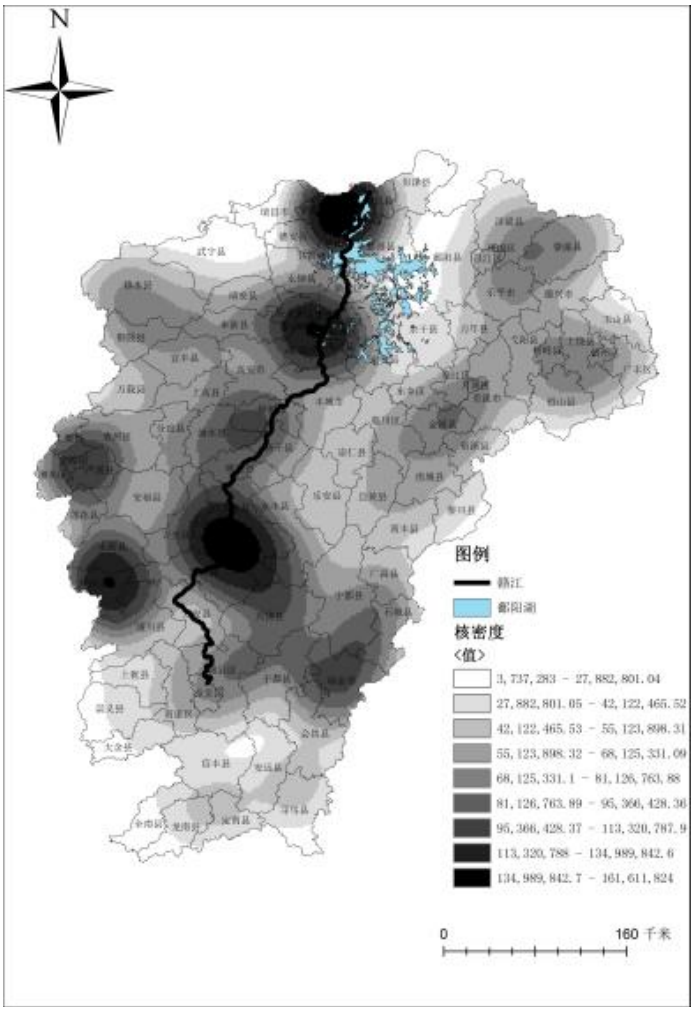

图 5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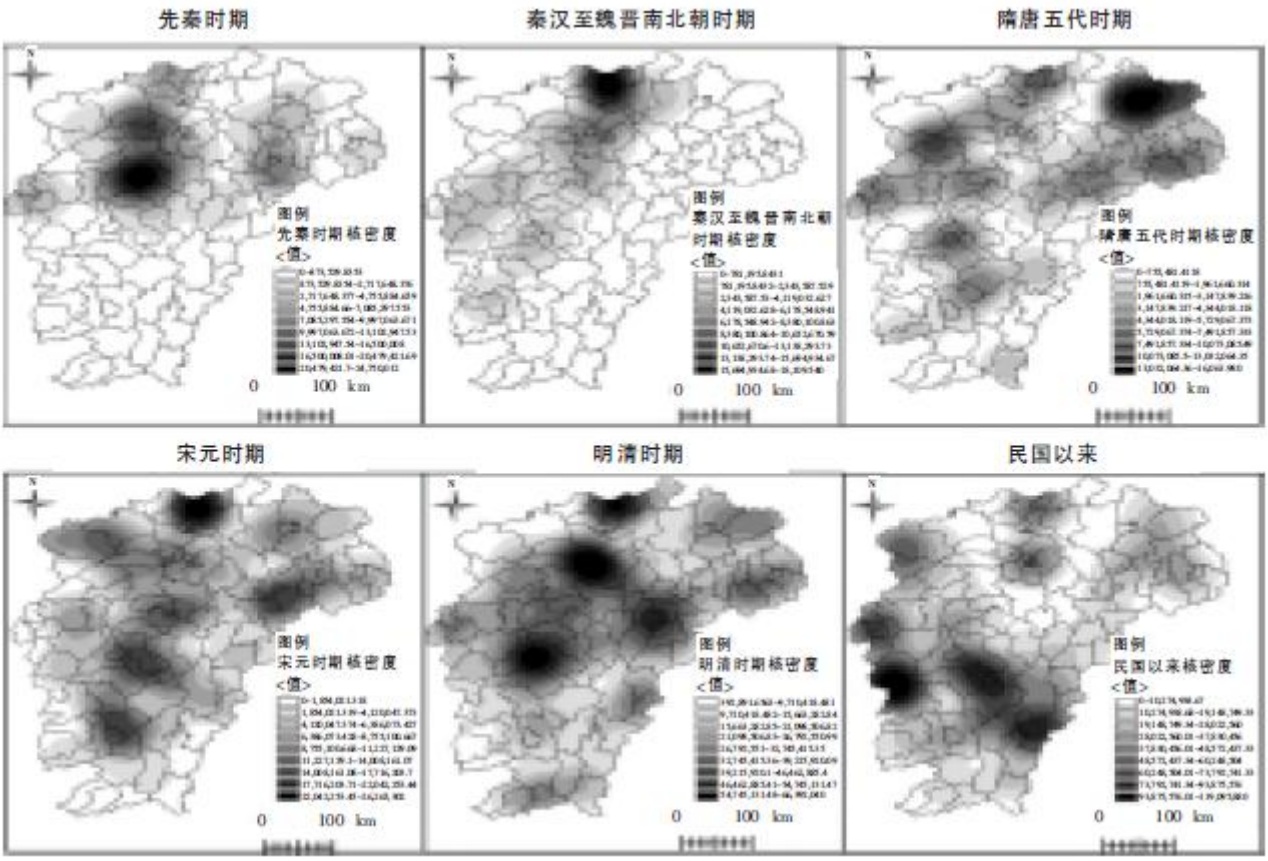

图 6 不同时代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先秦时期江西省属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区域。鄱阳湖在新旧石器时期也尚未形成,赣鄱文化这一时期同早先的中华文明一样,被孕育在各分支河流的交叉之处[14]。例如樟树市附近的筑卫城遗址、大洋洲遗址和修水的山背文化遗址附近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聚集中心。因为先秦时期的文明主要为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河流交叉处带来的肥沃土地使得既有利于渔猎又有利于农作物灌溉。

3.1.2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密度分布仍然是“一花独放”的状态,分布较先秦时期更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九江市区附近,文物类型主要以西晋和东晋时代的古墓葬与古建筑。同一时期江西其余地区主要以古遗址与古墓葬为主,零星分布在赣西和鄱阳湖周边地区,其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因此没有形成密度核心。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传播,秦朝江西虽属九江郡,但郡治不在江西境内,至汉高祖刘邦时期,在今南昌境内设立豫章郡,使江西第一次设立了省级行政中心,至此以后,江西全境逐渐开化[15]。使得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城址,诸如紫金城遗址和皋阳城遗址等。到东晋时期,中原政权偏安长江以南,带来技术与人口,使得江西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江西的宗教文化发达,据统计,长江之滨的庐山,从东晋到唐宋时期,寺庙最多达到 380 余所[16]。庐山的东林寺更是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因此这一时期江西文物保护单位大量的分布于庐山周围的九江市境内,形成集聚中心。此外,这一时期赣鄱文化深受陶渊明等文人影响,开始形成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特点[16]。石窟寺及石刻类文物保护单位的出现是很好的印证。

3.1.3 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表现出为“一超多强”的状态。在赣东北景德镇、婺源附近形成一个大的集聚中心,在铅山县、吉安县、宜丰县和九江市区附近形成若干个小的集聚中心,沿鄱阳湖、赣江的集聚轴带也初现雏形。

隋唐五代时期地处赣东北的景德镇瓷业开始兴起,大量的陶瓷工业作坊使得景德镇地区遗留下大量的瓷业遗址、瓷土矿和银矿遗址,形成了一个集聚中心。瓷文化也开始成为了赣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内其余次中心,多以佛塔、寺庙和古墓葬居多。因为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兴盛,且江西尤为繁荣,致使唐代有“做官去长安,拜佛去江西”之说[17]。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宗教遗迹。隋唐之前江西的经济文化属于荆扬文化圈,但是隋唐开始,江西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随着商品经济因交通因素开始繁荣,本地区经济文化开始独立孕育并形成富有赣鄱色彩的特点[14]。二是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大量人口南迁,为江西的发展和繁荣奠定基础。

3.1.4 宋元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在宋元时期开始向鄱阳湖、赣江一带分布,并形成九江、樟树、新干、吉安和赣州 5 个集聚中心。聚集中心不断向赣江、鄱阳湖这条轴带移动且集聚程度继续加深。这一时期文物类型的主要特点是集中了近 1/2 的石窟寺及石刻和 1/4 的古墓葬(表 1)。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完全南移,商品经济繁荣。并形成了沿长江—鄱阳湖—赣江—梅岭—珠江中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江西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地区之一,是连结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的必经之地[18]。江西经济开始大发展大繁荣,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宋元时期程朱理学兴盛,加之书院众多,江西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家(例如:陆九渊、文天祥、王安石、黄庭坚、辛弃疾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江西留下石窟、石刻和墓葬,成为了奠定了赣鄱文化兴盛的基石。同时人口也是重要因素,经济与文化需要人来推动,而宋朝江西人口居全国各省之首。

3.1.5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除了传统的赣江—鄱阳湖轴带上的九江、南昌和吉安的 3 个核心之外,抚州临川也形成聚集核心(图6),这一时期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激增,是宋元时期的4倍多,其遍布全省又集中于赣鄱水系及其支流周围。该时期文物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古建筑比例高达 84%,且少量存有 30 处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表 1)。

该时期江西继续凭借长江—鄱阳湖—赣江—梅岭—珠江所形成的南北交通优势,带动着全省人流、物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局势一直保持至晚清[19]。最终形成了以九江为中心的浔阳文化、南昌为中心的豫章文化、吉安为中心的庐陵文化和抚州为中心的临川文化的文化核心,与赣江上游地区的客家文化基本构成了现今赣鄱文化的格局。明清时代江西商品经济带动着赣鄱文化走向了鼎盛时期。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使得这些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

3.1.6 民国以来时期民国以来,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密度从传统的集聚中心赣江—鄱阳湖轴带之上转向了吉安青原区、井冈山市和赣州瑞金市 3 地,全省其余地区分布较为稀疏,仅在南昌、修水和安源等地形成聚集程度较低的密度中心。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前一时期有所增长,聚集性特点发生改变,从河流水系转向山区,民国以前集聚于赣鄱水系周围,进入民国以后转向赣南山区。文物保护单位绝大多数为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一分类,虽然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性,但是经进一步整理发现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474 处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中 421 处为红色遗迹。

赣鄱文化在经历明清的鼎盛时期之后,因为近代京广铁路的兴起、海运的地位超过内河水运,使得江西的交通优势丧失,赣鄱文化一度走向低谷,但近代的江西打响了革命的枪声,扛起了红色的大旗,成为了全国革命的急先锋。凭借赣南和罗霄山区的地势地形优势,在吉安青原区和井冈山市、萍乡安源区、赣州瑞金市等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不仅使得在上述地区遗留下大量的红色遗迹,而且使得赣鄱文化从蛰伏又走到潮头,以红色文化的内涵继续在江西的土地上发扬,有力的提升了江西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赣鄱文化的重要名片。

3.2 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样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7)。五大类文物除石窟寺及石刻的文物保护单位仅一个聚集核心之外,其余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四大分类的文物保护单位都是拥有多个集聚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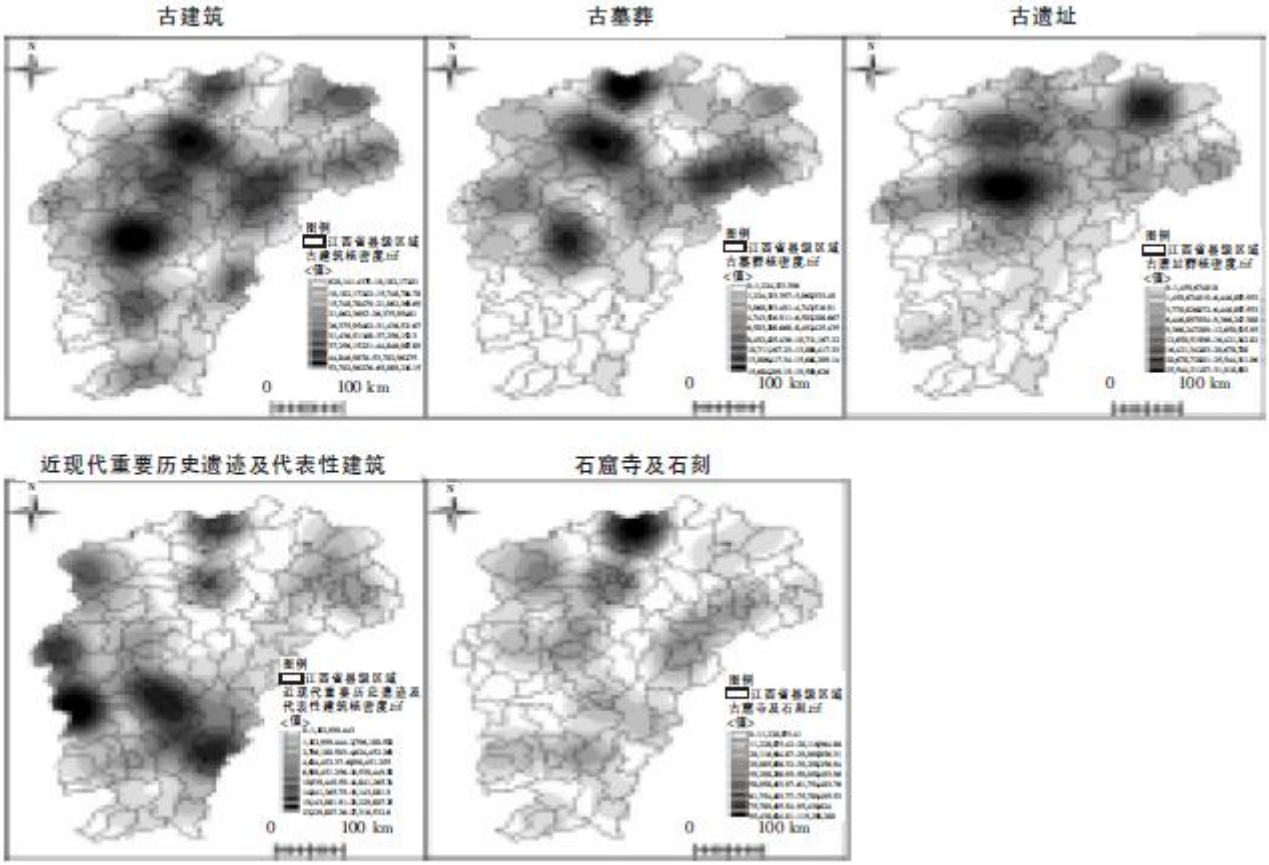

图 7 江西省不同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

古建筑和古墓葬这两类文物保护单位都主要集中在赣江—鄱阳湖文化轴带之上的九江市、南昌市、吉安市以及轴带之侧的临川、贵溪和婺源 3 个次级核心。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依托长江经赣江至珠江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九江、南昌和吉安成为了古代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几个城市,是江西赣鄱文化的代表地区,因此会遗留下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古建筑。吉安和抚州临川在古建筑这一类文物形成集聚,因为两地一直是江西的才子之乡,人才兴盛使得这 2 个地区书院、名人牌坊的古建筑众多,而婺源则是形成一个徽派建筑的聚集核心。古墓葬这一文物保护单位在江西主要集中在这样三大类:名人墓葬、宗教墓葬和墓葬群。其中江西省境内的古墓葬多为名人墓葬,因为宋元以后江西省文学家众多,例如:辛弃疾、王安石、周敦颐、黄庭坚等,众多的名人以及文学家使得江西境内古墓葬主要以名人墓葬为主,文化的兴盛也表明宋元以后江西的经济开始繁荣。江西境内少量的宗教墓葬主要是因为江西宗教文化繁荣,有着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林寺、青原派发源地净居寺以及道教文化的发源地龙虎山等。

古遗址这类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形成景德镇市、樟树市、新干县密度中心。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主要集中在井冈山市、吉安青原区、赣州瑞金市和萍乡安源区附近。石窟寺及石刻则只集中在九江市区附近。古遗址在全省主要形成了三大集聚中心,景德镇市地区千年不断的陶瓷文化遗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古窑址、古矿址;樟树市和新干县因为地处赣江中下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人类活动历史早,保存着江西省先秦时期人类生产生活遗址和城址等。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在江西的分布状况主要和江西省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五次反围剿、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等重大

历事件有关,因此这些地方在地理空间上就形成了密度中心。石窟寺及石刻,全省仅在九江市附近形成密度中心,数量接近石窟寺及石刻的 1/3,这主要是因为九江地区“山多洞奇”特别出名,庐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石钟山更是因为苏轼的石钟山记闻名天下,龙宫洞是江西最大的溶洞等原因,让九江地区拥有众多石窟寺及石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平均最近邻指数 R 为 0.559 236 <1 表明其空间上为集聚分布。具体来看呈现出“一轴多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以长江—鄱阳湖—赣江为轴带形成的传统赣鄱文化下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区。和轴带两侧形成的富有红色文化内涵的安源、井冈山、瑞金三大次级核心集聚区。

2)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时间跨度长,集聚趋势的发展同赣鄱文化的形成脉络基本一致,早期江西经济依附于荆扬经济文化圈,没有形成独立特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人类活动一致,主要集中在赣江与鄱阳湖的各分支河流的交叉处,尚未形成赣鄱文化轴带;隋唐以后江西的经济地位因为赣鄱水运的影响而提升,人类活动不断向赣江与鄱阳湖沿岸集聚,从而形成富有赣鄱特点的江西文化,至民国,又因为江西水运交通优势下降,赣鄱轴带随之消失,但是赣南的革命活动为赣鄱文化注入了革命的血液,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物都集中在该地区。

3)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有两大特征,以民国时期为界,民国之前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临水性”特点,主要趋于集中在赣江和鄱阳湖及其支流周围,民国之后具有“山地性”特点,主要趋于向赣南山地集中。

4)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同时代空间分布重心随着时间的推进,移动速度出现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移动方向总体向南。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心总体向南也反映出江西省人类社会活动的移动趋势。先秦时期江西远离中华文明核心区域,至汉高祖在赣北设豫章郡,中原文化才开始向南传播,自北向南辐射全省,基本奠定了江西省文保中心的总体移动趋势。

5)除石窟寺及石刻这一类文物仅集聚在九江附近之外,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这四大类文物都是呈现多核集聚,尤其古建筑及古墓葬与全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相似,聚集于赣鄱轴带之上,主要受宋元之后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较大。石窟寺及石刻这类文物因载体的特殊性分布受限,主要集中在九江山多溶洞一带。古遗址主要分布在万年县、樟树市和新干县等地,与先秦时期江西主要人类活动范围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受到水系、土壤和地形等影响较大。近现代重要历史遗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空间分布主要与近代江西革命事件和运动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山高林密,反动势力薄弱等原因,井冈山、瑞金和安源成为革命的首先之地。

4.2 建议

1)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不均衡,部分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资源偏少,应对文物保护集中区进行重点保护,同时加大对文物保护数量稀少的地区申报力度,努力挖掘江西省的历史文化资源。

2)历史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借助文物保护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收入,还能带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江西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新增一个发展引擎。让赣鄱文化又借助旅游业形成的产业链不断提高知名度,向全国乃至世界传播,实现“经济借文化发展,文化借经济传播”的双赢局面。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革命运动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使江西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利用好近现

代文物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既是对江西深厚革命历史的尊重,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振兴苏区以及在新时代发扬革命精神的必然选择,使江西的红色文化在全国起到传承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 奚雪松,许立言,陈义勇.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J].人文地理,2013(1):75-79.

[2] 张晓.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8):85-87.

[3] 杨嫚,冯渊博.河南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智能城市,2016(8):339-340.

[4] 包书月.北京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及其对城市文化空间结构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5] 朱爱琴,周勇,陈君子,等.湖北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研究——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11):184-191.

[6] 戴其文,刘俊杰,吴玉鸣,等.基于区域视角探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资源科学,2013,35(5):206-214.

[7] 林晓峰.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特征研究[J].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18,35(01):78-86.

[8] 徐柏翠,潘竟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8,38(5):188-196.

[9] 程乾,凌素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2013,33(10):1166-1172.

[10] 《江西省自然地理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自然地理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11] 《江西省旅游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旅游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12] 张超.计量地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13] 侯军俊.赣文化时空演替和区划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14] 张泽兵.赣鄱水系与赣鄱文化的历史演进[J].鄱阳湖学刊,2011(6):83-89.

[15] 傅修延.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8(08):22-31.

[16] 魏佐国.赣文化资源挖掘与江西软实力提升[J].地方治理研究,2008,10(4):72-74.

[17] 方志远,孙莉莉.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0(1):52-61.

[18] 周绍森.宋代赣文化的辉煌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2):4-10.

[19] 李青.历史上的鄱阳湖与江西经济[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